封皮：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by Charles Bettelheim***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Second period: 1923–1930***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二时期：1920-1930**

**夏尔·贝特兰著（Charles Bettelheim）**

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翻译

夏尔·贝特兰对苏联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新解读，其第二卷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在1920年代对解体中的工农联盟的政策决定了苏联社会的未来。

到1921年，在1917年的革命中经历了摆脱战争、饥荒和地主压迫的农民，已经被多年的内战搞得筋疲力尽，心怀不满。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重建经济，这首先意味着必须重新建立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盟。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对这场危机的回应。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对这本书的评论（*Monthly Review*，1977年10月）中指出，一条是把问题看作是短期的，通过奖励和让步来安抚农民，通过农业生产的增长使经济至少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在这种观点中，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对农民的革命改造被视为一个遥远的目标。

斯威齐指出，第二条路线是，将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视为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需要制定政策，既向农民提供物质援助和奖励，以说服他们相信合作化道路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同时把他们的观念从孤立的小生产者改造成有社会意识的社会成员。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是第二种路线，但党并没有按照列宁的意愿发展新经济政策。本卷的核心是讨论列宁去世后党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这也是苏联所有后续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夏尔·贝特兰**1913年11月生于巴黎。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的研究主任，并自1958年以来担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les Centre d'Etudes de Planification Socialiste）的教授。他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研究中心和《计划问题》（*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杂志的主任。他于1936年在苏联工作，此后曾多次访问苏联。他曾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德国、以色列、墨西哥、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整个西欧进行学习和参加会议。他还曾多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曾在印度、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埃及和古巴担任技术顾问或经济顾问。他是许多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包括《印度独立》（*India Independent*）、《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经济计算和所有权形式》（*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eté*）、《论向社会主义过渡》（*O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与保罗·斯威齐合著）均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

Printed in U.S.A.

Jacket design by Martin Stephen Moskof

SBN: 0-85345-437-X

Monthly Review Press

62 West 14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21 Theobalds Road, London WC1X 8S

**注意**：这本书的英文翻译使作者有机会检查他的一些参考文献，并因此修改了部分文本。

**目录**

[前言](#前言)

[对“第二阶段”的简介](第二阶段#对)

[**第一部分 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

1. 重建货币和财政体系

2. 经济计划机制与程序的发展

**第二部分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乡村；分化和阶级斗争；农业政策和农业社会关系的转变**

1. 新经济时期的直接生产的社会条件

2. 新经济政策期间制约农业生产关系再生产和转变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3. 农村地区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

**第三部分 工业和城市部门内的矛盾和阶级斗争**

1. 工业和城市部门内的矛盾的直接表现

2. 工业和贸易中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之间的矛盾

3. 国家部门的所有制形式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构

4. 国有工业在整个生产条件再生产过程中的整合情况

5. 价格、工资和利润的范畴及其阶级意义

6. 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

**第四部分 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变化**

1. 争取工农联盟的斗争

2. 争取快速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斗争

3.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构成及其转变

**第五部分 “伟大的变革”和新矛盾的出现**

参考

索引

字母缩写和俄语词汇

Artel 一种特定形式的生产者合作社

Batrak 农业工人

Bednyak 贫农

CC 党中央委员会

CCC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of the Party）

CCTU 工会中央理事会

Chervonets 一种相当于10个金卢布或7.7423克精炼黄金的硬币，从1923年开始发行

CLD 劳动国防委员会

CLI 中央劳动学院（Central Labor Institute）

CPR(B) 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CPSU(B)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EC（一个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

Elektrobank 资助电气化的银行

Glavk 行政长官（通常由一个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领导）

Goselro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Gosbank 国家银行

Gosplan 国家计划委员会

GPU 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警察）

Khozraschet 财务自主（字面意思是“商业会计”）

Kolkhoz 集体农庄（通常组织为artel）

Kommuna 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比artel更深入，并根据成员的需要分享收益

Komsomol 共青团

Kontraktatsiya 农民与国家收购机构之间的合同体制

Kulak 富农

Mir 村社

Narkomfin 人民财政委员会

Kontraktatsiya 人民劳动委员会

NEP 新经济政策

NOT “工作的科学组织”

OGPU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Orgraspred 党干部的组织和分配部

Osvok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下属的负责重建固定资本的特别委员会（参与经济规划）

PB 政治局

Perekachka 字面意思是“抽水”；用于将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相当于向农业征收“贡品”的概念。

RSDLP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

RSDLP(B)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Proletkult “无产阶级文化”；致力于推广这一概念的组织的名称

Prombank 工业融资银行

Promfinplan 工业和金融计划

Rabkrin 工农检查院

RKK 劳动纠纷解决委员会

RSFSR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Serednyak 中农

Skhod 村民大会

Sokha 木犁

Sovkhoz 国营农场

Sovnarkom 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国内通译“苏联人民委员会”，不能很好的表达“人民委员的会议”的意思）

Sovznak “结算票据”；战时共产主义下发行的货币

Splochnaya 某一地区的“完全”集体化

Supryaga 农民之间的传统互助形式

Toz 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场（“共同耕种土地的协会”）

Tsekombank 负责资助市政事务的银行

TsGAOR 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

TsIK 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Uchraspred 党干部的登记和分配部（由Orgraspred取代）

Udarnik 生产突击队员

VLKSM 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或称共青团

VSNKh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ВСНХ）

VTsIK（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WPI 工农检查院

前言

我在本卷中的目的是继续分析1923-1930年苏联社会转型的过程，确定这一时期成功与失败交错的方式，从而为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随后经历的胜利与失败做准备。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有必要确定将生产要素纳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并尽可能清楚地重现（reconstruction）所考虑时期的基本阶级斗争。1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群众以及党员和领导人对实际社会关系的各种看法。最后，我们必须确定发生过的一系列冲突所围绕的理论概念和政治纲领的意义和社会影响。

因此，这种分析必须处理在几个不同层次上发展的复杂的客观过程，这必然导致变化，这些变化都以自己的速度进行，尽管所有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这迫使我们放弃任何一种理想化的方法，即声称要把苏联的历史“阐述”成某些“思想”的“实现”——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斯大林的思想。

换句话说，只有对苏联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的转变过程进行唯物主义的处理，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这一过程并从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系列的著作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意，主要是受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启发，把苏联的历史表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成果”。此外，这种理想主义方法是另一方法的“对等物”，尽管有着不同的“目的”，但相似地，这主要表现在道歉性质的著作中，这些著作将苏联的历史描述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决定的“结果”，并进一步假定，一般地说（也就是说，除了一些被认为已经或多或少迅速纠正了的“错误”之外），这些决定是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支配的，是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分析的结果。

对苏维埃形态（the Soviet formation）之历史的这些唯心主义处理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客观矛盾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以及看待现实的方式所起的作用（这些方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且影响了群众的愿望和领导人的观点）贬低成背景（如果它们还没有纯粹或干脆地忽略它们）。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苏维埃形态的转变过程，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2

唯物主义分析还要求我们拒绝将苏联的历史与任何理想的“模型”相比较，认为它在某一时刻“偏离”了这个模式，所以*从那一刻起*，一切都“走错了方向”。

因此，分析苏联社会形态的独特性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理解它所经历的巨大动荡的独特性质。考虑到苏联历史的特殊性，并不妨碍我们（恰恰相反）从它那里吸取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教训，因为这段历史在其独特性中具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即除了以特殊性的形式存在之外，普遍性并不存在。

下面几页不会按时间顺序“介绍”1923-1930年期间矛盾的发展。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这些矛盾交汇的时刻，即1928-1930年，产生的一个危机，“新经济政策的总危机”。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这场危机的一些重要方面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方式有关，也与逐步放弃新经济政策所表现的模糊形式有关。论如何，分析这场危机将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的矛盾，因为它们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并追踪它们在过去几年中的发展和交织的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导致了1920-1930年危机的条件以及这场危机的阶级后果。

本卷所分析的矛盾首先涉及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阶级的生产条件（即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特征）是如何改变的，而且还必须描述工业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分配关系以及工人的组织方式所采取的形式。我们特别关注工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包括旧的资产阶级和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机器”（”machinery”）中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而通过这些“机器”，工人阶级可以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或者发现自己的活动被导向了某个方向。在这几年中取得的成功，与遭受的挫折一样，对1928-1930年危机的形式及其结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卷中还分析了农民及其各阶层与苏维埃政府结合的社会关系。

所分析的矛盾往往以经济矛盾表现自己。因此，应该让人们了解以价格、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和隐藏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工业和农业价格运动的阶级意义，这些运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工农联盟的命运。

我们的分析从根本上涉及到政治矛盾，但这些矛盾不能（像人们经常试图的那样）仅仅归结为各种反对派与政治局中的多数派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这些矛盾也是党的领导层制定的政治路线的内部矛盾，这条路线包括了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在1928-1930年危机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这条政治路线经常与党和国家干部的实际做法相矛盾，而这种做法的后果迟早会对政治路线产生影响，导致其转变。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布尔什维克将其许多决定付诸实施的手段是有限的。这种限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党在农民（构成苏联人民的绝大多数）中的存在不足有关，与国家机器的许多部分几乎不具备无产阶级性质有关，3也与国家机器的这些部分与劳动人民之间建立的关系之类型有关。

然而，限制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以及群众主动之可能性的不仅是由于政治因素，而且也是由一定数量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发展所决定。因此，我们必须相当仔细地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及其转变（ideological form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s）（这些转变本身与整个社会形态中发生的转变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将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一些观念，以及在群众中出现的一些观念，常常导致一些正在发展的矛盾之存在被掩盖起来，导致对那些被承认存在的矛盾的不正确理解（interpretation）4，或导致多少不太适当的决议被通过，即它们没有达到目的，削弱了苏维埃无产阶级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Bolshevik ideological formation）的特点首先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当时可以借鉴的有限经验。它们还与十月前和1917-1923年期间党内形成的冲突有关，因此也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中的矛盾有关。最后，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由意识形态构成在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时经历的变化和苏维埃形态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所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过程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导致了对苏维埃政府必须解决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更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特别是由于党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薄弱，它促成了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偏离的观念之加强。还应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概念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本人使用的某些表述的机械化理解，而被赋予虚幻的“合法头衔”。我们将看到，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在其1846年著作中所使用表述的运用，在这些表述中，“社会”作为一个“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阿尔都塞用语——译者）出现，其中社会关系的总体似乎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这发生在那句著名的话上：“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这句话可以在狭义的经济主义-技术主义（economist-technicist）意义上进行解释。

本卷末尾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它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苏联社会形态中发展起来的某些矛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没有得到完美的把握，至于它们得到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一系列未曾想到的后果，这些后果越来越难以控制。

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以最直接的方式暗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中存在的一些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概念，在1930年代成为“既定的真理”，影响了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些政党。因此，这些政党在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诱导犯了与布尔什维克党类似的错误。6

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矛盾和转变的分析，仍然与今天的关注点有关。即使是现在，一些有理由自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所采用的某些提法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这些提法在苏联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消极作用，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布尔什维克党所接受的、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一些提法或论点密切的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继续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所说的，特别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意义和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的决定性作用，今天被苏联修正主义者重复了。通过重申这些公式，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采用类似的说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论点所产生的结果，以拒绝苏维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拒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为没有这些学说，就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的斗争推向胜利。

因此，下面分析的核心是影响苏联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与影响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只能在这里开始讨论。也许我的文章可以作为一个“摆正”这个问题的起点，这个问题被错误的表达为“个人崇拜”。它真正的意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因此只有在我的下一卷中才能分析。不过，对这个问题直接提出一些方法论上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价值的。

首先，必须指出，为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严格处理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析苏联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及其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联系。斯大林的问题，如果不放在这个双重过程中，就不能被正确地提出。从历史上看，斯大林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作者”。当然，他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但他的行为和决定所遵循的路线既不能脱离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不能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手段，也不能脱离党内和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只有严格考虑所有这些客观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才能分析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以及斯大林的活动，并理解这种活动如何有助于维持十月的一些征服成果（conquests），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通过允许一些做法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会大大削弱苏联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破坏掉了其中的一些征服成果，并深刻地动摇了工农联盟。但是，只有对苏联社会形态所经历的变化的具体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的具体分析也表明，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是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集中了党的领导层的观点和一部分苏联群众的一些愿望。这些观点和愿望的性质在苏维埃形态的历史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因此，“斯大林问题”只有通过“划分时期”才能正确解决。

无论如何，在下面几页中，我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对它们的处理必然附属于对苏维埃形态所经历的变化过程的初步分析。

注释

1.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斗争的了解只能是非常不完整的。当然，最重要的因素可以通过参考公布的文件，通过解释苏维埃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所通过的决定来掌握。但是，对群众的斗争和思想状况，特别是对构成群众的不同阶层的更透彻的了解，要等到以后，当目前对研究人员关闭的档案向他们开放时，最重要的是，当通过关心了解自己过去强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人民自己参与重现自己的历史时，才能实现。与此同时，我们只能看到最突出的发展——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2.在让·艾伦斯坦（J.Elleinstein）的《斯大林现象史》（*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一书中，我们发现理想主义的方法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相互交融。苏联所经历的发展被证明是某种社会主义概念“适应”俄罗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适应该国革命开始时生产力的低水平，适应其群众的最初状况。艾伦斯坦写道：“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英译本，第32页），以及“沙皇传统和东正教礼仪”的负担（同上，第56页）。正是在这种“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地形”上，发展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类型”(法文版，第247页；英译本未收录)。因此，“起源神话”对分析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是有责任的。当然，拒绝这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否认一些没有得到控制的矛盾对苏联社会形态产生的影响效果（这些影响是普遍的，因此可以在苏联以外的其他地方出现）确实采取了具体的俄罗斯形式。然而，当我们试图从苏联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时，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变化中找到有普遍意义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把握它们（这些形式将与具体的俄罗斯“地形”“有关联”），但也要超越这些形式的特殊性。

3.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全》，43卷）关于这一点，见本作第一卷。由于缺乏使这种“机器”革命化的群众行动，它的特点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4.最能说明错误理解的例子是，有人试图把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歪曲”完全归咎于小生产的主导地位，以此来解释这些歪曲。事实上，这些歪曲也与集权主义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在1930年代，当小规模的农民生产趋于消亡时，这些歪曲却变得更加严重了），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打击这种发展，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集中形式符合社会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支配要求。

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一卷

6.当然，如果某个共产党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一些错误论调的影响，那就必须在这个党的社会实践中，在它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中，在它的内部结构中，在它产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或多或少的能力中寻找原因，总结我们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对“第二阶段”的简介

本卷的目的是展示导致1928年初开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矛盾的运动，并在1929年底达到高潮，彻底放弃了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1这一放弃对应着政治路线的彻底更改。这种改变的决定性时刻被斯大林本人称为“大转变”或“巨变”（“great turn” or “great change”）。2

下面的分析涉及到导致这种放弃的矛盾冲突、新经济政策本身以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真正结束的“伟大变革”。

只有对1923年至1929年期间苏维埃的形态所特有矛盾的交织和转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能使我们了解苏联在1930年进入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新时期，即五年计划的具体条件。这一新时期将在下一卷中加以研究。

1. 新经济政策作为工农联盟的政策

人们在讨论新经济政策时，往往认为它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政策”。它的名称（“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暗示了这样一种理解（interpretation），而最初为实施它而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是为了恢复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并让农民拥有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更大的主动性。

1922年初，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还在说：“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3

然而，除了眼前的表象（这也是现实），以及“新经济政策”这一词汇所造成的混乱之外，新经济政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政策”。4它也远远超出了对农民和一些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让步”政策。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一种“退却”*，即最初用来定义它的比喻。它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积极联盟*：这种联盟被列宁越来越明确地定义为不仅要确保“恢复经济”，而且要通过无产阶级带给农民群众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援助，使*带领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成为可能。5

新经济政策作为农民和无产阶级执政的积极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与1920年代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条件相适应。

新经济政策所要建立的阶级联盟的特点，不应使我们忘记，这个联盟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的。马克思反对拉萨尔，对拉萨尔来说，相对于工人阶级，其他社会阶级构成了“反动的一帮”。列宁在1919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在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很久之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工人阶级对一般群众的专政，而是阶级之间的联盟。他宣称：“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6。

在回顾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之后，列宁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7[斜体强调——夏尔·贝特兰]

因此，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既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也不是单纯的“退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尊重一定数量的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和基本原则。在苏维埃俄国的条件下，*这一形式的必要性*是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中得出的教训之一。这一经验表明，必须以*阵地战*取代1918-1920年的“正面进攻”的企图。这场“战争”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前提是只要执政党清楚地认识到，它一开始所处的地形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现实社会关系，并且只要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如果要控制和改变这些关系，就得通过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这场新的斗争中，来帮助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1922年4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列宁对这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方面，他表明，最初作为新经济政策特点的“退却”阶段（在1921年初开始）已经结束，必须停止这种“退却”，尽管不是停止新经济政策本身。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两个原则：首先，新的推进必须是谨慎的（符合阵地战的要求），其次，特别是，这种推进必须*与农民一起*进行。

下面这句话特别有意义：“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8

这一表述中的两个关键表述是（1）“前进”，这表明在1922年，正如列宁所见，新经济政策必须使*前进*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恢复生产力”）；（2）“（只有）同农民一道”（“只有”在此处补译，贝特兰书中原文为“only together with the peasantry“，与《列全》中文版有差异——译注），这意味着前进（向社会主义迈进）必须*与农民群众一起*来实现，党必须“学会帮助他们”。

1923年1月，列宁具体说明了就农民而言，这种向社会主义的推进应该采取的形式之一：“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在同一段话中，列宁再次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普遍发展可以导致社会主义，只要它不是经济和政治胁迫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这句话的原因：“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

所引用的这句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在这个特定的段落中，“文化革命”这一表述的内容仍然相当模糊。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发展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对所宣布的原则的号召支持（rallying）。重要的是这种“号召支持”的具体内容，它所决定的干预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及党将其决定的措施付诸实施的实际能力。这一切构成了新经济政策期间所遵循政策的现实，并对1923年至1928年期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过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以及在 1928 年和 1929 年的总危机中达到高潮。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对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和局限性所作的分析远不是稳定和一致的。它因时而异，对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来说也不尽相同。

每一种理解都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的两种基本倾向结合的结果。在不同的时刻，其中一种倾向或多或少地占了上风；这既适用于党的多数派本身，也适用于党的同一个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

其中一种倾向导致新经济政策沦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政策”，一种“撤退”，人们不得不暂时认命，直到形势使人们有可能“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0并恢复进攻。这种倾向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放弃新经济政策之前，不可能采取*真正的攻势*。

另一种倾向——更符合列宁自己的思想路线的倾向11——宣称，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是可以修改的，特别是为了响应号召农民群众支持合作社和集体生产。这种态度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并不认为必需在不久的将来“抛开”新经济政策，而仅仅是*转变*（*transform*）它。

这两种倾向中的第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如果把它走到极致，就意味着把新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旦条件允许，就必须抛弃它。

相反，如果第二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则意味着认为只要党采取适当措施，新经济政策就能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这种解释并没有把追求新经济政策和向社会主义迈进说成是相互不可调和的。然而，它并不否认这种进步可能包括处于附属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必须逐渐地受到阶级斗争的控制，然后加以改变。

在所有的犹豫和暂时的起伏之上，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方式是受到历史发展制约的。在第一个历史时期（直到1925年）盛行的解释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相对持久的阶级联盟政策。然而，它倾向于将这一联盟的内主要容归于经济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这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排除采取直接改变布尔什维克党和农民之间政治关系的措施，如“振兴”农村苏维埃的政策。

在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底开始，当宣布“恢复期”已经结束（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认为新经济基本上是临时性质的这一想法发展到了越来越大的程度。在实践中，这一观点表现在，对*原则的声明*肯定了基本立场不变，而*具体采用的措施*与其*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这些措施*在政治实践层面上*越来越多地违反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些要求，特别是在与农民群众关系的方面。因此，正在进行的是*逐步放弃NEP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积极联盟所主张的所有政策*。因而，在1928-1929年出现的“新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由于不实行新经济而造成的危机——工农联盟的危机。

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的变化，使我们能够理解党在1923-1929年期间作出的某些决定的性质，但它们远不能对这些决定作出充分的解释。一方面，相当多的决定是在眼前困难的压力下作出的（特别是从1928年开始）。这些决定或多或少都是临时作出的，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方式之后进行过修改，更多的是为了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提供回顾性的理由，而不是作为决定这些决策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的这些变化，其本身需要得到解释。只有通过分析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中发生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它们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才能找到这种解释；政策的成败，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以及或多或少受到控制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普遍运动。

2. 作为“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及其截至1927年的结果

新经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把国家从饥荒和经济混乱中解救出来，在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内战和外国干涉，国家已经陷入了这种混乱。开始时，这些经济任务也是直接的政治任务。

对苏联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基本的生产部门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考虑到十月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还要超越这些水平。苏联政府实现了这一目标，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它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将国家从内战结束时陷入的巨大困境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尤其是由于工人和农民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劳动，取得了特别巨大的成果。

（a）农业生产

1926-1927年，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按战前价格计算，其价值达到1117万卢布，这意味着比1921-1922年增长了100%以上，比1913年增长了6%，而在前一年，1925-1926年的增长率为5%。121926-1927年，粮食总产量比1922-1923年高出25%以上：约为7640万吨，而1925-1926年为7450万吨。13然而，在那个时候，战前的粮食收成水平（8260万吨是1909年至1913年的平均水平）14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农业生产的其他一些部门正在取得进展，尽管大多数农场的现有设备是供应不足和过时的。

因此，在1921-1922年和1926-1927年期间，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农业部门之间是非常不平衡的。此外，1925-1926年之后，农业生产趋于停滞。这种放缓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

（b） 工业生产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26-1927年的生产量是1921-1922年的三倍。然而，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弥补了以前的下降；1926-1927年的工业生产只比战前增加了4%，而比前一年增加了15.6%。15

如果我们仅就加工业而言，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巨大的。1927年，这个生产部门的指数（以1913年为100）为114.5。此外，这种进步在随后的两年中还在继续。1929年，这个部门的指数为181.4，这*使苏联在制造业生产的增长方面，与战前相比，处于欧洲所有国家的首位*。16

如果我们比较不同工业部门（制造业和采掘业）所取得的进步，我们会发现进步的速度非常不平衡。1926-1927年，煤和石油的产量显著地超过了战前水平。铁和钢落则落在后面。棉纺织品的产量比战前高出70%。17

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进展并没有像农业生产那样出现明显的放缓迹象。当我们把它与人口增长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从整体上看，它的发展速度更快：在1913年至1926年期间，人口增长了7%，达到1.47亿，其中1800万生活在城镇；而消费品工业生产指数在1928年达到120（100是指1914年）。18

（c）交换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是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交流（这种发展构成了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这个目标不仅要通过增加生产来实现，而且要通过建立令农民满意的经济关系来实现——在“战时共产主义”下，他们向城镇提供物资，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产品的回报。

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广泛发展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的作用，存在了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以及价格变动对商品供求的影响和对一些投资方向的影响。然而，从1921年开始的几年里，一批国家机关的活动也在发展，它们的活动旨在通过*计划*、集中财政收入和实行*投资计划*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保障扩大再生产，使其不受商品关系的*直接影响*。

现有的数字并不能使我们准确地估计与1913年相比，交换的演变情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926年农民为了获得支付税款所需的钱而向城镇和城市贸易供给的农产品数量要比1913年少得多。此后，农民的大部分出售是为了*支付他们用于购买工业品的费用*。

从整体上看，1926-1927年的贸易额是1923-1924年的2.5倍。即使我们考虑到在此期间价格上涨了约50%的事实，总的交易量在三年内也增加了60%以上。此外，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农民在城市市场上的销售额的大幅增长，这些销售额在1922-1923年和1924-1925年之间增加了3.3倍（按现行价格计算），在后来占到零售业营业额的三分之一以上。19

另一个证明交易量大幅增长的证据是铁路运输吨位的迅速增长，在1922年至1927年期间，吨位增加了三倍多，这一年的吨位比1913年的水平高出5%。

这几个指标有助于证明1922年至1927年期间经济复苏的程度。而且，在1927年以后，生产和交换的大多数部门都在继续进步，因此，这种进步与粮食“收购（procurement）”领域所经历的危机之间的对比就更加突出了。

为了解释这一危机及其发展的方式，我们需要研究工农联盟所表现的矛盾形态。由于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和作用常常被低估，因此这项研究更有必要了。

3. 1923-1929年工农联盟的巩固和苏维埃社会形态中的矛盾

1923年至1927年工农联盟的巩固，主要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建设性工作的基础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生产和交换领域进行的，但其范围要比生产和交换广泛得多。

在教育领域，上学的人数空前增加。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按整数计算，从1914-1915年的790万人增加到1927-1928年的1150万人。20与1922-1923年相比，城镇学生人数增加了140万，农村学生增加了280万。21的确——我将回到这一点上来——所给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以及工人和农民在这个任务中所应扮演的角色，都远远不符合。但是，数量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建立了与生产中的实际工作相联系的教育体系。

在群众的阅读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1927年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数量，在城镇为4350万册（1913年为470万册），在乡村地区为2570万册（1913年为420万册）。22这一进步更加重要，因为总的来说，十月革命后出版的东西都带有新的革命精神，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争论范围很广，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趋向，所以基本上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千篇一律的风格。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中，9岁至49岁的居民中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能够读写。

在卫生领域，医生人数从1913年的2万人增加到1928年的6万3千人，尽管1918年至1923年期间有大量医生移民国外。23农村地区的医疗从业人数迅速增加，但按居民人数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城镇。物质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死亡率从1924年的21.7%下降到1923年的18.8%。

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当然有其*政治基础*——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问题的特别关注（尽管由于党在农村群众中的存在感不强，对其活动造成了严重的限制）。这种巩固与工人阶级（主要是工会）和农民阶级（主要是农村苏维埃和农业合作社）的群众组织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24

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巩固，不可避免地是在矛盾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相互联系和处理方式，解释了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它是如何转变的，以及为什么它最终以一场表示放弃的“危机”告终。

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私营部门与国家和合作部门之间的矛盾，因为后者主要是由苏维埃国家领导的，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1928年，这个部门贡献了国民收入的44%，工业生产总价值的82.4%，占零售业企业营业额的76.4%。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总值中只有3.3%来自这个部门。25我们将看到，私营部门在农业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私营贸易所起的相当大的作用（加上自1926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所奉行的政策中日益增长的矛盾），部分地解释了1928年和1929年的危机，以及那场危机的显著特征。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以其他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些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特别是那些将工人阶级与“私营”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立起来的矛盾，特别是当后者阻碍工人的主动性时。这种矛盾在1928年下半年变得尖锐。

在1923-1929年期间，这一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将农民与苏维埃政府对立了起来。1929年，由于对这个矛盾的处理方式，这个矛盾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矛盾。它与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要是使农民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分为*Kulaki*（富农）、*bednyaki*（贫农）和*serednyaki*（中农）。

向城镇供应粮食的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对“粮食收购”26影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可能巩固或破坏工农联盟的措施。在我们必须分析的条件下，1928年以来所采取的措施逐步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完全放弃。

4. 粮食收购、其波动和工农联盟的状况

“收购”一词是指由国家经济机关和经官方承认的合作社网络*为购买农产品而进行的活动。*

收购的正常运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政治上，它的顺利开展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之一得到了巩固的外在标志。在经济上，这一顺利进展确保了城镇和工业所需的供给。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价格稳定，并有助于对外贸易的国际收支平衡。在上述最后一点上，粮食收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粮食出口是为进口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对那些能够帮助工业发展的进口。

在新经济政策中，收购是在与“私营部门”购买活动的竞争中展开的。原则上——从工农联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NEP的一个重要方面——收购必须以*农民愿意出售的价格为基础*，而且必须只涉及*农民准备交付的数量*。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意味着，收购必须是一种市场买卖（marketing）的形式，而不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征收或征税形式。事实上，直到1927年底，收购都是这样运作的。

收购对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保证了他们的产品有稳定的销路。它也是*经济计划的基础之一*，因为经济计划的正确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收购业务的恰当运作。

原则上，收购机构足够大规模的干预使这些机构能够*全面控制*这些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这也意味着控制“私人”贸易中普遍存在的价格。因此，如果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干预，就构成了一种*执行符合工农联盟需求的价格政策的工具*。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苏维埃政府试图实行这种价格政策。然而，它并不总是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得再讲一遍。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收购的发展不仅被认为是确保增加对市场控制的工具，而且也是逐步赶走私人贸易的手段。驱逐私人贸易的斗争是新经济政策期间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它旨在加强将农民与苏维埃政府联合起来的*直接经济联系*。

在1922年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强调，为了加强工农联盟，被任命为中央国家与合作社贸易机关负责人的共产党人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击败资本家*：“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27

列宁解释说，苏维埃政府的工商业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证明它能比私人资本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确保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他还说：“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28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这些原则，基本上一直坚持到了1927年。因此，国家和合作部门在一般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证明了它的活力，证明了它在真正意义上进行收购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展示*它在整个商业运作中所占的份额*，读者必须了解这个部门的总体发展。这里有一些数据。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危机前夕（1926-1927年），批发贸易已经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合作部门。国家机关负责50.2%的批发贸易，而私人贸易只占5.1%；其余44.7%由合作社贸易负责，而合作社贸易本身也要接受国家机关的指示。29

1927年后，批发贸易在苏维埃政府的直接控制下继续发展，但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归功于（工商业的）监管（regulatory）措施的应用，但这并不足以阻止贸易领域中一系列矛盾的发展。

在*零售业*中，国家和合作机构的地位不如在批发业中那么明显，但在1926-1927年，它们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在当时的零售业营业额中，他们分别占13.3%和49.8%，民间交易者占36.9%。1928年和1929年，后者所占份额下降到22.5%，然后又下降到13.5%。30

尽管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它的所有目标，特别是在价格和购买或销售的预期数量方面。当我们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危机是如何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地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暂时注意一下，在价格问题上，私人贸易与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矛盾。私人商贩的转售价格高于国家和合作机构的价格，因此能够为农民的产品提供更好的价格；这对国家在稳定价格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的收购活动产生了有害影响。这种矛盾刺激了针对私人贸易的行政措施，但这种措施在农民看来往往是他们亏损或者是被剥夺了赚取更多金钱的机会的原因。

无论如何，在1926-1927年，国家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主导地位，而迄此都没有诉诸过（无论如何，在任何大规模的情况下）禁止措施。

根据党在1927年底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规定的指令，31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必须遵循党决定的“价格政策”，以使苏维埃国家能够在农产品的买卖中执行积极的政策，并使*商业服从于计划的目标*。

实际上，国家和合作社贸易在当时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成功地获得对商业运作的控制。这一点在粮食收购这一关键领域变得尤为明显。困难在这里以最显著的方式出现，并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必须着手研究这种情况。

（a）收购的进展，然后是危机

1927-1928年开始的“收购危机”首先涉及的是粮食——这类产品在当时的城镇居民饮食和苏联出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粮食收购*的演变。

首先可以看到，1926-1927年的收购量为1059万吨。与该年的收成一样，它比前一年的收成（841万吨）32大得多，而且进行起来有一定难度。

1927-1928年的收成不如前一年，为7360万吨，33即比1926-1927年少280万，比1925-1926年少90万。收购规模略小于1925-1926年是可以预料的：实际上，裁减的幅度很大，而且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一开始有适度减少：1927年7月至10月，收购量为374万吨，而前一年同期收购396万吨，减少了5.4%——如果考虑到收成的减少，数值就会减少。然后，*在11月和12月之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月里，收购量不超过139万吨，这意味着*比1926-1927年的相应时期减少了近55%*。34

实际上，考虑到收成的萎缩，这种减少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种收购上的短缺危及到了对城镇的粮食供应*。它还危及了收购计划目标的实现——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同样重要，收购计划本身又与*出口计划*相关。*尽管收成减少，但收购目标却比前一年的数字增加了170万吨*。35因此，党被迫迅速做出反应。

（b）“紧急措施”及其直接后果

党和政府对粮食收购量严重下降的反应方式，是由于对形势的分析比较简单——或者说是由于分析过于简单，而只考虑到了农村矛盾发展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我们将看到）实际上并不是首要的方面。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收购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富农扣留粮食，由于某种“富农破坏”。36党的领导在这样分析了形势之后，在1928年初认为，必须以限制和征用来回答这种“破坏”。这就是所谓的“非常”或“紧急措施”，这些术语旨在强调所采取措施的临时性质。

“紧急措施”本身并不需要从根本上违反NEP的原则（这意味着不应求助于征用），因为它们应该只适用于犯有非法囤积和投机行为的富农。它们的“法律依据”是1926年通过的《刑法》第107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正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目的是“限制农村资产阶级的剥削倾向”。37

如果紧急措施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可以从富农的农场没收的粮食数量，收购机构就无法实现其目标计划，而这些计划的目标非常高。

因此，在实践中，*紧急措施变成了与反对富农投机的斗争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一种“经济政策”的手段，旨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向国家粮仓输送尽可能接近收购计划规定的粮食数量。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家机关和地方党员干部都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指示。如果收购量不足，干部们就会受到惩罚。迫于压力，地方官员征用的粮食数量远远超过富农农场的粮食数量。因此，应急措施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首先打击了中农，甚至打击了部分贫农。38米高扬负责管理委托收购的行政机构（贸易人民委员会；译注：米高扬同时担任了对外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他实际上指出，*大部分小麦“剩余”由中农持有*，从他们那里没收的小麦是通过被官方谴责为“*有害、非法和不可接受的*”39措施取得的。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方机关坚持认为，如果要实现收购目标，就必须没收属于中农的粮食。在北高加索地区（*边疆区*）发布的一份党内通知给出了以下指导方针：

在继续榨取富农家庭的剩余粮食，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他们把剩余粮食卖给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粮食储备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中农手中。由于这个原因，2月份的收购将主要以村庄里的*中农*为代价，也就是说，它们将被少量地收集起来。40

这些做法在许多地区引起了危机，并激起了广大农民阶层的不满，他们认为正在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

党的总秘书处收到了关于实施紧急措施的方式以及它们在农民中引起的反应的令人不安的报告。1928年2月13日，斯大林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通知，通报了导致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承认党包括党中央委员会以前都犯过错误。41就收购的粮食数量而言，他对紧急措施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但谴责了在农村所犯下的“歪曲和过火行为”，这些行为可能“造成新的困难”。斯大林列举了这些过激行为的例子：“强行摊派农业公债，建立类似巡查队的组织以及任意捕人、非法没收余粮”，结论是“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坚决消灭”。42

这些警告导致3月份的粮食收购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4月初的CC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必须迅速恢复符合NEP要求的收购程序。43

农民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了，但这种减轻很快就伴随着收购的急剧下降。4月份的收购量最多到24.6万吨，而1928年前三个月的月平均收购量为144.6万吨，1927年4月的收购量为43.8万吨。44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认为这种下降是过度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紧急措施被重新实施，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厉。这些措施甚至对贫农的影响越来越大。党试图组织这些贫农与富农进行斗争，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粮食储备，以便树立榜样，否则也会对他们实施制裁。

1928年春天，组织贫农和batraki（农业劳工）的尝试没有结果。冬天开始时，一部分贫农和工人帮助完成了向富农征收的任务，但后来他们得到了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和自我组织起来的激励：征收的产品的25%分配给了他们。春天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收购组织要把所有的粮食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实现给他们的目标。

在这种新情况下，人们发现，富农对农民其他阶层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45从狭隘的经济和统计学的直接观点来看，实施紧急措施所取得的结果还是可以被视为“有利的”。农业运动（1927年7月1日至1928年6月30日）结束时，尽管收获量明显减少，但收购总量接近1926-1927年的1038万吨，而不是1059万吨。然而，这一直接的“统计”结果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收购危机的中期和长期后果，以及紧急措施的应用。

在1928年，情况已经很明显，其中包括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利方面：整个城乡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特别是工农联盟受到破坏，因为事实证明，不可能只对犯有投机罪的富农采取紧急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党越来越难以不采用紧急措施了。了不采取这些措施，党必须彻底分析正在进行的发展，包括那些与当时正在启动中的工业化进程的形式有关的发展。它还需要具备能恢复与农民的信任关系的政治资源，以及制定和推行*一种不同形式的工业化*所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46

但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党不但没有放弃紧急措施，反而在1928-1929年重新开始使用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以更严重的形式再次出现。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1929年，局势紧张到仅仅是继续采取紧急措施就会使事态走向死胡同。一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完全放弃*，47即1929年底的*“大转变”*。这使苏维埃的形态进入了一个充满激烈矛盾的新时代。

在1930年代，工业化进程加快，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许多工人在政治、经济和行政领域担任有权力和责任的职位。然而，与此同时，工农联盟破裂的后果也显现出来。它的破裂是由于“从上而下”的集体化造成的，其特点是，除了少数人以外，农民步入*集体农庄*（*kolkhoz*）制度并没有表现出对集体农场的热情转变。

工农联盟的破裂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它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的衰落，等级关系和专制的领导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大幅下降，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

5. 对新经济政策的放弃过程

完全放弃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反映出（如具体分析所示）对任何预先设想 “计划”的实施。这种放弃也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或“经济危机”的要求而发生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危机，那也只是*一场政治危机、一场阶级关系危机*的结果。

1929年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基本上是阶级斗争与不受控制的矛盾两者的*客观过程*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做出的一些“决定”是这个过程的特征，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是些*附属因素*。它们没有能力真正指引这个过程所采取的发展方向（course），而且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效应（effects）”，一般来说，与预期的效果大不相同。

只有厘清构成这一历史进程的动力的矛盾和冲突，我们才能理解它的发展方向和特点，并*从中吸取教训*。这种澄清要求分析作为NEP特点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其行动导致这些关系转变的社会力量。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尝试进行这种分析。它首先论述了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然后论述了在农村和城镇发展的社会矛盾的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参与到阶级斗争中的群众之活动*的结果，但它是基于*现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它的方向是由不同阶级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作用的方式决定的。各阶级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下，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研究党内的辩论和党的决定，并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构成及其所经历的变化进行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只分析社会结构上层建筑中的发展，就无法解释这些辩论的结果、党所做决定的性质和后果以及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反，真正的解释需要将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情*与阶级斗争的总体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联系起来*。

必须考虑的关系和力量是相当复杂的，这些关系和力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也很复杂。因此，下面的分析集中在看似重要的方面。它的目的只是阐明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一进程的意义仍然是最重要的*。

注释

1 关于NEP的正式开展，见第一卷。

2 《斯全》12卷，《大转变的一年》

3 《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4 “经济政策”这一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任何影响生产和交换条件的政策都会影响阶级关系，因此都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干预。

5 见第一卷

6 《列全》36卷，“《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7 同上

8 同上（我的斜体强调——夏尔·贝特兰；《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译注）

9 《列全》43卷，《论合作社》

10 “把新经济政策抛开”的说法是斯大林在1929年底，12月27日对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中使用的。在这段话中，斯大林并没有说必须立即放弃新经济政策。他说这是在一个他还不确定的未来发生的。同时，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并解释说这不意味着任何退缩，“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斯全》，12卷，《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29-1930年冬季采取的措施标志着对NEP的抛弃。

11 即使在1929-1930年，当NEP在实践中被放弃的时候，这个概念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理论上所坚持的概念。因此，自相矛盾的是，直到1931年，当新经济政策所剩无几的时候，党还在宣称它没有被放弃，而是在继续推行。（见下文）

12 根据E. Zaleski在*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viet Union, 1918–1932*书中计算的数字。扎列斯基的数字取自各种苏联资料。当然，它们只是相当近似的估计。

13 这些数字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统计资料中都有：特别见S.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et paysanne en URSS（1921-1928）: Le Problème du blé*, 113页。

1927-1928年，产量下降到7360万吨（来源同上，338页）

14 V. G. Groman,*Энциклопедиа русского экспорта*，第一卷，第175页。1913年的收成由G. M. Krzhizhanovsky估计为9670万吨，*Десять лет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ССР 1917-1927*，第34页，由Grosskopf引用，第113页。

15 见*Gosplan SSSR, Pyatiletny Plan*, vol. I, 15页。这些指数与整个工业有关，是根据战前价格计算的。

16 1929年，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危机前几年的顶峰，法国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为142.7，德国117.3，英国100.3 (见*Industrialisation and Foreign Trade*, p. 134)

17.见S. N.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URSS, p. 282

18.Narodnoye khozyaistvo SSSR v 1961 g., pp. 7, 169

19. 见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pp. 459-460, and B.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en URSS*, p. 112

20. 见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806

21. Ibid., p. 814

22. Ibid., p. 851

23. Ibid., p. 880

24. 这些发展将在这本书中进行分析

25. *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57

26. 关于“采购”，见下文

27. 《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28. 同上

29. See *Kontrolnye tsifry na 1927–1928* gg., pp. 77–88

30. *Sotsialisticheskoye Stroitelstvo SSSR* (1935), pp. 552–553.

31. 见 K.P.S.S. v rezolyutsiyakh i resheniyakh, vol. 2, p. 342.

32. 见 A. Mendelson, ed., Pokazateli konyunkturi, p. 51.

33. 见 Table 199 on p. 338 of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34. 按注32所述工作数字计算的百分比。

35. 1928年1月1日，1927-1928年的农村采购计划只完成了39.3%，而在一年前的同一天，它已经完成了63.7%。(见 M. T.Chernov, “Opyt khlebozagotovok 1929–1930 g.,” in *Ekonomicheskoye Obozreniye*, no. 1 [1930], p. 30,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4).

36. 在1925-1926年的冬天，尽管收成很好，但采购却暂时减少，人们对这一现象也倾向于做出同样的解释：然而，当时它并没有导致采取与1927-1928年相同的措施，采购量最初下降的影响很快就被克服了。

37.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250–255.

38.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6.

39. Mikoyan，《真理报》, February 10, 1928.

40.来自北高加索边疆区党的办公室的通告，来自党中央的档案。见G. A. Konyukhov, *KPSS v borbe skhlebnymi zatrudneniyami v strane* *(1928–1929)*, p. 152, quoted in 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p. 222.

41. 《斯全》，11卷，“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42. 同上

43. 见*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372 ff.

44.诚然，在1926年第一季度，采购只带来了84.1万吨（根据注31中引用的作品中的数字计算）。

45.早在2月，米高扬就已经提到了贫农的“犹豫”。几个月后，人们承认其中许多人甚至转向了富农。(see Bauman’s article, “Uroki khlebozagotovok,” in *Bolshevik*, nos.3–14 [1928], p. 74).

46.这意味着一种不那么集中、不那么“现代”的工业化，呼吁更少的财政资源和更少的进口，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当地资源和工农群众的主动性。

47. 这一点见下文

第一部分 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

分析新经济政策这一先繁荣后以危机结束的阶段，要求我们在整个这一时期考虑到两类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是商品和货币关系，另一方面是由改变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再生产条件的经济计划所产生出的政治关系。

后一类关系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并没有“消失”：使它们存在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因为社会生产并没有停止成为“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因此，尽管对商品交换发出了各种“禁令”，社会生产的产品仍然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1

更一般地说，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就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直接劳动时间的长短仍然是社会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仍然以价值为基础，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剩余劳动：因此，生产者还没有占有“本身的一般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下册中所说的。2

列宁在号召布尔什维克党采用新经济政策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现实。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所做的是*承认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3并为这些关系的再生产自己创造条件，从而清楚的揭示它们；因为这些关系的转变和破坏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

因此，一系列的决定付诸实施，其中首要的决定是在工业和贸易中恢复有限的私人部门，4最重要的是，努力重建开放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这使得以货币形式进行核算成为可能，并要求存在一种应尽可能稳定的货币。5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还致力于为这些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转变*以及最终的*消失*创造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条件。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初步阶段是建立一个计划机构，该机构应发挥职能，*使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再生产受制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施加的条件和政治关系*。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这一点在本作品第一卷已经说过。

2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表明，从生产自动化开始的生产力体系的转变，带来了“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也带来了“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人更多的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存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种转变中，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而这又是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如果是这样，“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就结束了交换价值和剩余劳动所发挥的作用。”（译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ｂ）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

我们显然必须警惕一种认为后者必然结束的“技术主义”理解，他并没有说这种作用会自行结束。马克思所阐述的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作为社会体”对它的掌握，而这种理解和掌握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这种革命决定了人和他们的劳动之间的不同关系，这种关系把这种劳动看作是它的本质，即直接是社会劳动。因此，当工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后，共产主义劳动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是占有和分配形式的转变方式之一。（见本作品第一卷中引用的列宁关于这一点的评论）

3 关于这一点，见《列全》43卷以及本作第一卷。

4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运作的工业和贸易的私人部门，包括个别手工业和贸易企业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虽然各种手工业者的活动没有被正式禁止，但由于缺乏原材料和运输工具，他们的活动经常处于瘫痪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采纳使经济总体状况得到改善，手工业活动得以恢复。农村手工业的复兴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那些活动被正式中止的手工业企业，在1921年夏秋之际采取了法律措施，使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生产。1921年7月7日的一项法令允许“自由从事”手工业职业，并允许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开办雇用不超过20名工人的小企业，如果使用机械动力，则雇用不超过10名工人。1921年12月10日的一项法令将一些被国有化但实际上没有经营的小企业归还给它们之前的所有者。1922年5月22日的一项法令扩大了建立私营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权利。这项权利被授予给任何人，无论是单独还是协作行动，作为公司还是合作社，“以便发展生产力”（第4条）——条件是这项权利不得“以违反指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方式使用”（第1条）。除此之外，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规定，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出租给私人资本家，或者作为特许权授予外国资本，如果它们的生产可能因此而更快地增加。（见E.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p. 299 ff., and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pp. 274 ff.）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里（广义上说，直到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止），主流思想是，私营企业最终一定会“自己”消失，也就是说，通过国有企业的竞争，一旦它们组织良好，就会比私营企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商品。

1925年初，人们仍然认为扩大私营企业的发展可能性是可以接受的。5月，一项法令授权官方在某些条件下允许私营部门在每个企业雇用多达100名的工资劳动者，而租赁企业可以雇用几百人：一个例子是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劳动”（“Proletarian Labor”）工厂，这是一家生产金属制品的私人公司，1925年10月雇用了650多人。（见Y. S. Rozenfeld, *Promyshlennaya Politika SSSR*, p. 494,以及*Planovoye Khozyaistvo*的副刊, no. 12 [1925], p. 7, quoted by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vol. 1, p. 35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人资本部门在工业中的经济作用总体上仍然相当有限，但在贸易，特别是零售贸易和手工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见下文）。

5 这种努力也适用于国营部门的生产单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那里引入了“商业会计”或“财务自主权”（khozraschet）（见下文）。